



城門水塘興建之時，共八條村受影響需要搬遷。金文泰曾親自到訪城門谷聆聽村民的陳情，惟香港急切需要增加食水供應，居民在未能得到滿意賠償的情況下悉數搬離。在城門水塘貯存量低時，能夠看見昔日村民生活的痕跡。



圖中為九龍副水塘及水壩。九龍副水塘於 1929 年由金文泰提出興建，1931 年竣工，為金文泰任內第二項推動的水務工程。

目 錄

本書運用檔案說明	5
第一章 導論：中英變局、粵港關係——	
一名港督的政事、日常與煩惱	7
一、政事：省港大罷工後金文泰面對的粵港變局與社會管控	10
二、日常：解決水荒與個人休娛之間	16
三、煩惱：金文泰與英國外交部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	19
四、小結	26
第二章 鍾情香港，平步青雲：從官學生到港督的步履	27
一、以香港為職業起點的抉擇	28
二、官學生中的明日之星	33
三、金文泰的中國之行	35
四、歷任港督對金文泰的評價	38
五、金文泰和香港華人領袖的交往	41
六、金文泰與香港大學的因緣	43
七、金文泰的調任與重臨	46
八、小結	48
第三章 軟磨硬抗，手段多變：應對省港大罷工的挑戰	51
一、互探虛實：香港政府與廣州國民政府的首階段談判	53
二、策略調整：由思考動武到重啟談判	70
三、從鴿派到鷹派：視武力為終止罷工的唯一手段	84
四、小結	91

第四章 去政治化的政治管治：工潮後的嚴密社會管控與 粵港關係的重建 93

- 一、金文泰眼中香港問題的源頭：英國對華政策的失誤 97
- 二、二次罷工對香港的威脅及應對方針 106
- 三、金文泰「香港中心」對華政策的構成 111
- 四、鐵腕管治：新聞審查制度及取締香港工會 113
- 五、修復粵港商貿關係與重建經濟 128
- 六、小結 136

第五章 以「文」為術：管治香港的軟手段 137

- 一、身為學者的金文泰 141
- 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創立緣起 149
- 三、官商學合作發展香港中文教育 155
- 四、港大中文學院的發展與改革 164
- 五、小結 171

第六章 制度化籠絡：維護「蓄婢」的管治思維 173

- 一、1929年初粵港社會狀況 175
- 二、香港蓄婢爭議與《1923年家庭女役條例》的訂立 178
- 三、英國政界對香港的施壓 182
- 四、《1929年家庭女役條例（修訂）》與香港上層華人的反應 193
- 五、創立「保護兒童會」的社會因素 200
- 六、小結 209

第七章 懷柔新政：殖民管治下的「民生」建設 211

- 一、籠絡新界鄉紳：廢除新界建屋補地價政策 213
- 二、發展新界的政治考慮 222

- 三、不獲認同的提案：永久佔據新界 231
- 四、水務工程與香港發展 240
- 五、小結 257

第八章 悻悻而去：金文泰的離港及後續聯繫 259

- 一、突如其來的調任 260
- 二、是榮升？還是被逼離港？——讓金文泰困惑的羅生門 263
- 三、傷感的離別：金文泰的鬱悶 269
- 四、金文泰的未竟志業 277
- 五、金文泰與香港舊友的聯繫 280
- 六、小結 285

第九章 終章：殖民者的執拗與現實上的困境 287

附件

- 一、〈港督在新界演說詞〉 298
- 二、〈港督在長洲歡迎會上之演說詞〉 300
- 三、〈六月二十四號督轅茶會金制軍演說詞〉 302
- 四、Personal Letter from Cecil Clementi to Matthew Nathan, 31st
December, 1929 304

參考文獻 307

後記 318

香港第十七任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875－1947），於 1925 年 11 月至 1930 年 1 月在位，前後四年多。在這四年裏，中英兩國關係多變。從歷經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1925 年 6 月－1926 年 10 月）到蔣介石（1887－1975）北伐乃至統一中國，其間爆發漢口、九江英國租界被中國民眾收回管治權，也發生英國向上海派遣「上海防衛軍」。在同一時間，中國國內政局波譎雲詭、內戰頻仍。英國外交部面對中國國內變局以及民間浩浩蕩蕩的民族主義浪潮，為保護英國利益而需要調整對華政策。在這段時期，中英關係撲朔迷離、脆弱不堪。在這種情勢下，作為香港總督的金文泰正常來說，他只需要管理好英國既已霸佔的土地，便完成其職責使命了，中英關係如何多變，實在也不需他多加操勞或過問。不過，他並不安份於此；他對粵港關係乃至中英關係充滿濃厚興趣，甚至是橫加干涉，這為他帶來了不少煩惱。

金文泰督港四年任上，應對的最大政治危機莫過於省港大罷工的工潮衝擊，他在這四年間為香港留下的貢獻莫過於發展水務工程與推動社會文教。同時，他修訂及訂立的一些社會管治法例甚至是影響至今。他在工潮期間與國民政府及罷工委員會的談判手段，工潮後無情打壓工會及管控輿論方面的雷厲風行，都顯示他是大英帝國殖民管治系統中的「佼佼者」。在香港歷任港督中，他的受歡迎程度也說明了這一點。一直以來，他以親善華人、雅好中文而被人所津津樂道。

然而，金文泰也是魯迅（1881－1936）筆下那名被譏諷的「金制軍」——因為「督率」高等華人、前清遺老祭孔，變成了保存國粹、尊孔

復古的「洋主子」。¹就此而言，金文泰的個性與形象，是多面而複雜的，其施政手腕也是獨具一格的。

我們絕對無意要美化金文泰這樣的一名英國殖民地官員，基本上，他是一名治港能手，既贏得在地紳商、民眾的歡心，又維護了英國管治香港的利權。因此，我們認為他毫無疑問是有值得注意的做事魄力及管治能力，這對於我們了解香港社會文化的「殖民性」（Coloniality）是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於本書而言，殖民性是指英國於其搶佔之地實施殖民管治時對被殖民者留下的深刻思想影響。這種影響，反映於殖民者的悉心經營的文化價值觀深入於某些被殖民者的骨髓裏，致使殖民管治雖然結束，但昔日宗主國殖民管治文化仍然流淌於他們的血液裏，使之繼續依戀及崇尚舊日的政治制度、社會文教、節慶禮儀、日常交流用語乃至日常飲食、衣着風尚等等。他們不只是在生活習慣上，還有價值觀念上都在殖民管治結束後繼續存在。因此，這些生活習慣或文化制度，被視為先進的現代文明，體現了現代世界主流的、優雅的、高尚的及普世性的文化價值；相反，母國的文化則反過來被視作落後、愚昧、野蠻及非理性的。職是之故，雖然英國殖民管治已經完結，但它所留下的政治制度乃至人們的思想意識，仍然停留在殖民管治時期，甚至引發人們對於殖民管治產生各種新的想像——更可能反過來妖魔化母國的固有文化、文明。

透過這本書，我們固然可見金文泰的管治為香港留下的影響及歷史遺產，同時能夠相對全面地了解金文泰其人其事。基本上，金文泰也是一位十分堅持己見的人，很有膽識地向前推動自認為正確的事，甚至在施政方針及對華政策上，不惜一再與英國政府其他高階官員較勁，這在香港歷史

1 相關研究請參 Lin Shaoyang(林少陽), "Hong Kong in the Midst of Colonialism, Collaborative and Critical Nationalism from 1925 to 1930: The Perspective of Lu Xun and the Confucius Revering Movement", *China Report*, 54:1(2018), pp.25-47.

上的二十八位港督中，算得上是少數中的一位了。² 正因為如此，我們在今天研究金文泰在港經歷、其人其事——尤其是他的社會管治手腕，對於我們重新認識香港歷史、反思社會文化發展中的一些深層問題，甚至是了解中英關係的近代演變，都會是有所裨益的。

一、政事：省港大罷工後金文泰面對的粵港變局與社會管控

金文泰的人生事業是以香港為起點，他於 1899 年 12 月首次抵港，以官學生的身份展開他在港的十三年官職生涯，直至 1913 年才以副輔政司身份奉調前往圭亞拿升任等同輔政司的政府秘書。他在香港先後出任多項前線要職，深入了解香港社會。同時，他也曾經多次踏足中國內地，不只在廣州學習中文（1900 年），還曾參與廣西一帶賑災救濟工作（1903 年）。他更曾多次放棄回英國探親的機會，利用長假期深入中國內陸考察。他進出中國內陸的路徑，充分反映了英國殖民地官員的政治視野與戰略眼光。1901 年，他由越南進入雲南以展開華西水陸兩路的考察之旅。1904 年，他以上海為起點，遍遊華中華北，考察各省市的鐵路建設。1906 年，他取道廣西，考察一番後進入緬甸仰光，然後以印度為終點。1907 年則更加用了九個月時間，以莫斯科為起點，進入中國新疆，然後展開中國西北、華中多省的考察工作，最後以廣州及九龍的鐵路建設考察作結。數年下來，中國的天南地北，四鄰要塞，民情風俗，金文泰了然於胸（詳見本書第二章）。

至 1925 年年底，本任錫蘭輔政司的金文泰再度重臨香港，他是以前危授命的形式督港。等待他的，是一個政治與經濟都出現大問題的嚴峻局面。當時的香港，省港大罷工方興未艾，香港經濟受到重創，港府施政舉

步維艱。在十六個月的工潮衝擊下，共七十多萬人口的香港有逾二十五萬人離港，當中不少是主要的勞動人口。香港的經濟活動幾乎停頓，居民的平常日用也因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圍封而大受影響。香港確如省港罷工委員會官方刊物《工人之路》所說的，儼然成為了一個「臭港」。³

英國當局委派金文泰走馬上任，看來是個明智的選擇——當然，凡物都有兩面性，他的優點在一些人眼中可能也是他的缺點所在。這點我們在後文將會再論。但毋庸置疑的是，金文泰比過去的港督贏得了更多的香港在地民眾的支持。為維持社會秩序，除了港島市區的華人紳商為他鞍前馬後效勞外，他也獲得昔日在新界工作時結識的新界父老擁戴，甚至為他舉辦五十一歲隆重壽慶（詳見本書第七章）。

由此，反映金文泰之前在港留下的功績，成為了他在後來督港時期的施政資本。這也反映了他深知中國的人情世故，善於經營政商、官民關係之一斑。可以說，在他出任港督前，已對香港社會的人事物與風俗了解不淺。這樣，在他處理多變局勢下的香港問題時，便可以比其他殖民地官員擁更多的人脈資源與應變能力。他透過重用周壽臣（1861－1959）、羅旭龢（Robert Hormus Kotewall, 1880－1949）、曹善允（1868－1953）、李右泉（1861－1940）、羅文錦（1893－1959）等華人紳商領袖，走出了工潮引發的負面經濟影響。⁴

金文泰異於他的前任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 1876－1947，1919－1925 年間出任港督），他動用了在港長期累積的華人政商人脈，頻繁與廣州政府往來，多次派出代表前往廣州與當局洽談。他把掌握廣州國

³ 〈香港近訊〉，《工人之路》，1925 年 7 月 25 日，頁 4。

⁴ Tze-Ki, Hon, Hok-Yin, Chan. "A Voice from the Margins: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of Hong Kong, 1925－1930", In Chang-Yau Hoon, Ying-kit Chan ed. *Contesting Chineseness: Ethnicity, Identity, and Nation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pringer, 2021, pp. 41－57.

² 關於香港二十八位港督的研究，張連興有扼要的論述，十分值得參考。參見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2012 年。

民政府動向以及廣東的整體政局變化視為日常管治的大事，這些都可以從他的往來書信及公務函件中看到。

在動用本地華人紳商網絡與廣州政府談判以期盡早解決工潮外，金文泰也加緊香港本地的社會輿論控制。1926年7月6日，金文泰召開議政局會議（即今日的行政會議），在訂為“Propaganda”的討論議題上，他主張要繼續資助中文報刊《工商日報》為政府的宣傳喉舌，藉以收取政治宣傳果效。他明言因應時局所需，相關經費開銷是值得的，當天列席會議參與討論的，還有仍未正式成為議政局議員的周壽臣及羅旭龢。⁵

另外，金文泰於1927年2月4日召開的議政局會議上，於一項名為“suppression of newspapers”的討論議題裏，他決議港府要根據1922年訂立的《緊急情況規則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 Ordinance 1922）賦予的權力，用以處理報章查禁事宜。⁶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便能明白何以魯迅在1927年2月訪港時，把南來視為「畏途」，同時又批評「金制軍」（即金文泰）督率華民祭孔，並留下一堆遭受管制、打壓怨憤的背後原因（詳見本書第四章）。

至1928年，香港對外與李濟深（1885－1959，廣西人，粵系軍政領袖）主政的廣州政府重修舊好。自粵港關係穩定下來後，香港的民生活動逐漸恢復正常。對內，金文泰加緊立法及修訂法例管控社會，先後修訂法律條例取締大量工會——發起省港大罷工工潮的海員工會是金文泰的首要打擊對象，就連一些細小工會也未能逃過他的打壓。舉例說，茶居總工會就被列為非法組織而遭取締。1928年11月21日議政局通過議決後，中環警署立即派出七十餘人到位於干諾道西的茶居總工會，向職員宣佈取締的政令後，就將會址內的物件一一強行拆除。會址裏棲居的百多名失

5 Minutes of Executive Council, 6 Jul, 1926, CO 131/69.

6 Minutes of Executive Council, 4 Feb, 1927, CO 131/72.

業工人立刻失去容身之所。正如工會負責人稱：「該會成立以來，會規甚嚴，禁絕煙賭，向安無異。對外又無越軌行動，宣佈解散，三千餘名工友無所憑依。」⁷在這一兩年裏，金文泰還先後推出《禁止集會巡行條例》，以及立例管制報刊及出版行業，打擊一切不利於英國管治的言論，甚至要求中英文報刊出版前要先行自我審查（詳見本書第四章）。

直至1929年，香港的社會秩序已大致恢復，金文泰針對新聞的審查工作也沒有鬆懈下來。他在1929年2月13日寄給妻子的家書中指出，他當天與輔政司修頓（Wilfrid Thowas Southorn, 1879－1957）、華民政務司那魯麟（Roland Arthur Charles North, 1889－1961）、周壽臣、曹善允及劉子平（生卒年不詳，時任首席新聞檢查員）開會，商討新聞審查事宜。雖然他打算放棄在中國內地進行的政治文宣工作，但決定繼續審查香港本地的新聞。

由上可見，香港內部因應工潮爆發以來的抗英思潮雖然已漸漸散去，但港府對於「激烈文字」、「傳單」的防範一直沒有停止。在流行的中文報章中，仍然經常可見時人因身懷「傳單」而被捕的報道。甚至是一些市民因為隨身帶有「謝教單」——彩票的開彩通知，也會被誤認為傳單而遭到拘捕。⁸直至1929年，香港仍然派員搜查往來行人，一經發現身懷有「激烈文字」，便會立即拘押並送到法庭審訊。譬如1929年10月2日的《華僑日報》，便報道了一名名為林秀娟的少女，因身上的「藤唸」藏有激烈文字而遭到拘捕。⁹誠如魯迅所說的，香港社會當時處於宵禁時期，警察四出拘捕可疑之人（詳見本書第四章）。

港府不單監管平民百姓，金文泰在工潮後還立例管制華人廟宇，成立

7 〈港政府解散茶居總工會〉，《華僑日報》，1928年11月26日，2張2頁。

8 〈誤認謝教作傳單〉，《華僑日報》，1929年9月19日，2張3頁。

9 〈激烈傳單案初審〉，《華僑日報》，1929年10月2日，2張3頁。

華人廟宇管理委員會和推出廟宇登記條例，藉以監管廟宇財產及管制可能的不法行為。當然，為加強社會管治，他也大力推動文化教育建設，先後成立官立漢文中學及推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成立，發揚經史之教。上述的社會政治管治及打壓工會發展，再加上發展文教，可以看作是金文泰重整香港社會秩序，並求取得長治久安之效的「文治武功」（詳見本書第五章）。

至 1929 年初，隨着中英關係改善，¹⁰ 再加上緊鄰的廣東政局由李濟深掌管，有近一年的時間是處於相對安穩發展的狀態。金文泰與李濟深在重振兩地政商環境的洽談互動乃至互訪中，慢慢建立起互信基礎及私人友情。在他們的互動及合作下，香港的政經環境得到穩定向上發展的機會。金文泰在寫給他的伯樂、前港督彌敦（Matthew Nathan, 1862－1939, 1907－1909 年間出任港督）的信函中，告知他香港已經一切如常，粵港兩地商貿往來回復到省港大罷工以前的狀況。以政府賣地這項主要收入來源為例，香港在 1928 年已錄得近 150 萬港元的收益。金文泰認為成績相當理想，各項經濟規劃都有驚人的發展速度。¹¹ 香港新建房屋更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增加，居港華人對社會完全恢復了信心。¹²

但是，世事難料，1929 年仲春，發生了讓金文泰十分擔憂的事情，李濟深不容於蔣介石而遭到軟禁。李濟深的下台，立刻加深了金文泰對時局及香港處境的悲觀情緒。基於與李濟深的友誼，他答應了李濟深部下陳慶雲（生卒年不詳）的請求，為之向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 1880－1964）以及駐南京、上海等地的駐地總領事發出電報，請

10 Personal Letter, M. Lampson to C. Clementi, 23 Jan, 1929,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20/File 4.

11 Personal Letter, C. Clementi to Matthew Nathan, 14 Jan, 1929, Archive of Matthew Nathan, Box 351－352.

12 Personal Letter, C. Clementi to Penelope Clementi, 12 Jan, 1929, Additional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75.

求他們救助李濟深，為他提供政治庇護（詳見本書第六章）。¹³

基於廣東的政權有變，金文泰在家書裏一再向妻兒傾訴不安，¹⁴ 認為中國爆發內戰而將波及香港。香港原本可以因為李濟深鎮守廣東，儘管中國其他區域局勢不安，但因有廣東作為屏障而無需太過擔憂中國各軍政間的內戰。然而，李濟深既去，則廣東的不穩政局，使金文泰每天都表現得十分憂慮。不過，廣東的變局對於香港有什麼影響的關係，其實只屬於英國殖民地部及港府操心的事。對於英國外交部而言，它更要緊的事情是如何與統一中國的新政權建立外交合作關係。在中國未統一前，英國長期以來視北京的清政府、北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相比於想方設法要改善與國民政府關係的英國政府內閣，金文泰只是一心想要穩控香港的局面，在他與粵籍、粵系官員或香港紳商的來往互動中，他得悉表面上大一統、但實際上內鬥不絕的中國政府是十分脆弱的。他對於國民政府的前景極不樂觀，故對英國的對華外交政策也就十分不以為然。

金文泰基於粵籍、粵系軍政要員提供的情報，因而擔心親蘇俄勢力會再次在廣東乃至中國全域興起，他對於有力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馮玉祥（1882－1948）深有戒心。他認為馮玉祥是親蘇俄的，若馮玉祥主政中國，將會迎來英國對華貿易的黑暗時代。¹⁵ 他對中國政局的觀察與意見，與主管對華事務的英國外交部有異。他感到外交部官員對當前中國、特別是廣東與南京政府之間的關係不太了解，故推出的對華政策不合時宜，甚至是反過來有礙於香港社會的平穩管治。

13 Personal Letter, C. Clementi to Penelope Clementi, 21 Mar, 1929, Additional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75.

14 本書所運用的家書，主要是 1929 年間金文泰寫給其妻子 Marie Penelope Rose Eyres（Penelope Clementi, 1889－1970）及其子 Cresswell Clementi（1918－1981）的信函。

15 Personal Letter, C. Clementi to Penelope Clementi, 6 Apr, 1929, Additional Papers of Cecil Clementi, Box 75.